

中国全史

(简读本)

③1

报 体 学

刊

肖
璞

编

育

刘
晓
达

编

校

刘
英

编

史

史

史

经济日报出版社

学
校
史

第一章 远古至先秦时期

一、人类教育的起源

从猿到人的过渡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人类学家通常将人类自身的演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猿人、古人（早期智人）和新人（晚期智人），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在中华大地上，猿人、古人和新人三个阶段的人体化石已陆续发现三四百处。根据古人类化石和考古资料，可大体排列出自公元前 170 万余年至 5000 多年前父系氏族公社产生的发展系谱。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史上，始终伴随着教育活动。

（一）远古人类的教育活动

1965 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两颗猿人的门齿化石，经测定，距今约有 170 万年的历史，这里的猿人被称为“元谋猿人”，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原始人类。后来又 在“元谋人”故乡发掘出带有人工痕迹的石器、动物骨片和用火的灰烬，表明元谋人已初步懂得对最原始的劳动工具进行加工，并且已经懂得利用火来改善生活。

在北京西南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大约有四五十万年。在北京猿人住过的山洞里发现了很厚的灰烬，里面有火烧过的

一块块颜色不一的兽骨和石头，一粒粒朴树籽以及紫荆树木炭块。看来，他们经常在这里烧烤兽肉，并且已经能够保存火种，使用火和管理火了。火可以熟食，从而缩短胃消化食物的过程，有利于人从食物中吸收更多的营养，促进体质上的进步和健康。同时，火可用于御寒、防御猛兽侵袭，并能有效地帮助狩猎。从保存火种到人工取火，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又大大推进了一步。恩格斯说：“……磨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与动物界分开”。火的利用和控制是人自己创造的第二种光明，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不亚于太阳的光明。火是原始人最基本的文化价值之一，也是原始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火不仅在日常家庭生活，在狩猎和捕鱼中起了巨大作用，而且还在巫术或宗教仪式、原始艺术中起了多种作用。事实上，石器时代两种最突出的文化成果都离不开火：火照亮了洞穴，使岩画能够产生；火烧结了泥土，使陶器能够产生。作为后世农耕社会的灌溉器具（陶器）和耕种器具（铁器）都与火的发明、利用分不开。不同原始氏族的不同的人工取火技能和经验，借助教育活动，得到保存、传播、推广，成为氏族社会共有的生产能力，并代代相传，从而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

人类远祖在进化过程中，离开过树上生活的其他灵长目动物，获得了在地上以两足直立行走的习惯，由此获得解放的两个前肢和十指可以自由运用、制造工具，从而摆脱遗传限制，扩大了肉体器官的机能。人类的文化教育活动，奠基在极为漫长的使用、创造、更新、调节工具的劳动实践之上。最初的实践教育的成果往往以物化的形态加以表现，如生产工具和

生活用品。人类创造的文化直接凝结在自己的塑造物中，人脑的构想图样直接由自己的手和物质活动转化为实物。那时的教育活动是与物质生产活动和日常家庭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溶为一体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成果的积累，教育活动也开始以语言符号和图形等形式来表达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成果。人的发声器官也发达到能由各种复杂声音组成语言，以作为交流思想、传达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以及进行抽象思维的手段。人类学告诉我们，发展和使用语言的复杂事务是紧密地与手使用工具及发展其它技能相关的。最早的语言可能就是双手的手势系统。工具的发明、改良和语言的运用，又是脑发达的结果和前提；脑的发达又使依靠直立行走和运用双手成为可能，同时这又成为加强和促进人类更加娴熟地运用双手的活动。科学研究表明，同身体特殊部位有关系的脑表面积的大小，不是与该身体部位的大小相关，而是与其使用程度成比例。同手和手指有关的区域要比同脚和脚趾有关的区域更大，这是因为人类更常用双手。依据脑结构的研究，北京猿人的大脑左边比右边大，说明他们常用右手劳动，这一点从使用的石器上也可以得到证明。人类早期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在实践中反复进行的自我教育、自我调整和适应的过程。随着这种自我教育经验的积累和提高，原始人类又迫切需要将它传递给下一代，以保证生命的延续和发展。

不停活动和摸索探测的特性，是人类的遗产之一。它们对人类墨守常规的这种习性起了补偿作用，是人类进行创造发明的内因。在人类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和矛盾斗争中，人类的这种创造能力逐步发展、不断提高。远在能进行科学分析和试验

之前,人类的天生习惯就是窥视、试探、摸索。求生的本能使原始人类去注意寻找和改进能获得食物的工具。北京猿人已经能够制造、使用多种工具。山顶洞人的劳动经验和技能更超过了前人。他们的石器基本上还是打制和粗糙的修制方法,但是他们已经有了磨光、刮削、钻孔、刻纹和着色等新的技能。狩猎和采集,是这一时期人们的重要生产活动,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二)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活动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酋长或首领均由年长而有威望的妇女来担任,宗教祭祀的活动也由妇女首领主持,她们通常保管、分配食品,负责公社的管理工作。而且,子女的世系均从母计算,财产均实行母系继承制,亦如恩格斯所说:“共产制家庭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庭内的统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5页)

尽管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却也出现了适应原始农业的、经过打磨的石斧、石铲、石镰,还有木制、骨制的耒耜,昭示了社会生产力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时,人们的生活基本趋于定居,经营着原始的农业和驯养了一些动物。因而定居的生活与原始农业和简单的畜牧业就为文明的发展与教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从各种事实迹象看,当时的教育活动虽不存在文明社会的特征、内容与形式,却也在人类教育史的发展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母系氏族时期的教育活动是伴随着原始文明的发生发展而同时进行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传播原始文明的教育活

动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国母系氏族时期的原始文明的产生与进步及教育传授活动的开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天文知识的发展与传授。原始的天文知识是当时人们初步认识、探讨天象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随着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恩格斯所说:“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自然辩证法》,《马恩选集》第3卷第523页)就肯定了天文学产生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事实。在我国的母系氏族社会早期,人们从事狩猎和采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而形成了日的概念;农耕和畜牧产生以后,人们逐渐认识了月亮圆缺的规律,从而又形成了“月”的概念;牲畜的饲养、配种和繁殖,农业生产上的播种、耕耘和收割,都需要掌握不同季节的气象变化,从而又形成了“季”和“年”的概念。这在考古上也有所佐证。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的母系氏族公社繁盛时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上,就有太阳、月亮和星座的彩绘文饰,便很能说明问题。此后在这些初步的天象知识基础上,当时简单的天文历法也就产生了。估计当时的天文历法虽没有后世“夏小正”一类历法那样的体系和内容,却也对农业生产、畜牧业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这样,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日益重要,对天文历法知识的传授、教育与学习在当时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活动。虽然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却也没有理由怀疑这项教育活动的曾经存在。对天文历法知识的传授、教育途径当有二:一是从氏族专管天文历法的人那里获得;一是从其他的氏族成员和父母那里得到。但无论

以何种方式接受这一教育,同样对人们的生产活动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因而,这一教育就被母系氏族的成员所看重,由此那些负责此项知识传授的氏族成员就受到了人们的尊重。

其次是原始数学知识的进步与传授和教育。恩格斯说:“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页)原始人的数学知识也是与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而恰恰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盛时期,人们不仅完全脱离了简单的“结绳记事”的状态,而且在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前提下,人们的数学知识得以提高。氏族公社最初的土地面积的丈量 and 牲畜头数计算是数学知识发展的基础。由于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氏族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具备起码的计数的方法,而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氏族成员才懂得丈量土地的知识。计数的方法简单易学,既可由氏族成员或其父母传授,也可得到氏族首领的指点。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传授与受教育的权利只属于一部分妇女。

再次是文字的出现与传授教育活动。众所周知,仰韶文化的彩陶刻画符号已具备了文字的雏形,这也说明在这一时期,存在以在陶器上刻画文字、传播文字的事实。虽然我们还搞不清这时期陶器制作者的身份,但文字的传播与教授环节是不可缺少的。并且这种纯文化的传授活动表明母系氏族公社已处在了有一定文明水平的时期。

最后是宗教祭祀活动及其传授教育。有事实表明,当时的巫师大多由女性担当,主持祭祀的也是氏族首领。通过这样的活动,使氏族成员在精神和心灵上得到空前的陶冶和教育。

此外,还有其他方式的教育活动的存在。

当时的教育活动与后世相比,其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教育活动的主持者和传授者多是妇女。正如有一句名言:“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与后世相比,当时也还没有学校一类的机构,对儿童的教育也多依靠社会的教育,并且口耳相传是一种最重要的教育方式。

(三)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活动

大约在 5000 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大体上属于这一时期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存,有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这一时期,人们的谋生手段已开始主要转向农业和畜牧业,同时,渔猎和采集经济,作为人们谋取生活资料的补充手段,这时还在继续进行,并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金属加工业是此时生产中一项突出成就。红铜的出现,突破了我国原始社会若干万年的制石工艺,是一创造性的新工艺,使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制造铜器的过程中,有采矿、冶炼、锤击、制模、熔铸等一系列程序。生产技术比制石器、陶器要复杂得多。一部分人从事这项事业,促使了手工业的分工。同时,农业生产也有利于人的定居生活。

定居生活较之狩猎时代的游动生活,更有利于文化的积累和教育的发展。首先,定居家庭使人类生活安定,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提供了稳定而长久的保障。其次,定居生活也使人类在长期的实践活动和教育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能更好保存和传递下去。在游牧部落里,祖辈只能偶尔将自己的经

验传授给孙辈，在农耕社会的村落中，这种知识的传递和交流渐渐成为常规。定居家庭能给成长着的下一代以更好的教育，教育的目的性也更强，这都是游牧生活方式所不能比拟的。罗素指出：“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的是在于审慎，或者用一个稍微更广义的名词，即深谋远虑。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这种习惯是随着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的。”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计划性和预见性，人的劳动不像狩猎，不是当下就能见效的，而要经过一段时间。这就使教育同样带上了预见性和计划性的特点。这时候，水利与牧耕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与欧洲半岛特征相对的大陆特征，中国的水利农业文明特别发达，这种农业文明给其后的中国教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原始社会人类的教育首先与生存的迫切需求紧密相连。在渔猎采集经济时代，他们的教育内容就是怎样团结互助进行集体的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怎样与猛兽及其他自然界的敌人和威胁作斗争。在畜牧农耕时代，他们的教育，就是怎样架设栅栏，怎样寻找水草，怎样喂牛赶羊，怎样耕

种农田,怎样协调集体生活、进行社会事务活动等。为了保证原始人群的生存,必然需要教育来交流和传授实际的经验、技术、知识等。原始人群正是在极其艰苦的集体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出了人类最初的原始形态的教育。劳动即学习,父母长辈均是教师,猎场、牧地、农田即是学校,教育与生活、生产是一致的。这种教育一经产生,即为当时生产和生活服务,成为原始人生存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原始宗教在教育中的作用

原始人在促进自身发展的教育方面与他们对生命自觉意识的萌芽分不开,也与他们最初的想象力分不开。原始人的想象又往往与“梦”有关,梦境寄托着原始人的自由、希望、追求、超越,而这又成为教育的重要因素,使人的精神获得发展。黑格尔说:“艺术观照、宗教观照(无宁说二者的统一)乃至于科学研究,一般都起源于惊奇感”。从这个意义看,宗教是艺术文化的先导。在宗教教育中凝聚的是原始人对厄运、战乱、饥馑、灾荒的醒悟,其原始胚芽不能不上溯到祈求神威的上古礼拜活动。对死亡的恐惧是一切悲剧最深刻的基础,因为人类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永远活着,但他们却不免一死。费尔巴哈认为,唯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世上若没有死这回事,也就没有宗教。无论如何,死亡是使我们去探究生命意义的主要动因。人们对自己的死亡,是一种可能性的恐惧,但一个他所爱的人的死,则使他感到一种实际的恐惧,实际上只有在另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把他自己的死亡作为一种现实的事情来考虑。

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来看,最粗野的宗教是围绕着“死亡”产生出来的种种看法。从表面看,人们在祭礼中奉献上祭品与牺牲,祈求着神灵的保佑。实际上,祭礼与牺牲包含着更为广泛的人类的心理活动。黑格尔曾把祭礼说成是“主体将自己等同于其存在本质的永恒过程”,就是要说明在祭礼中,人企图通过这样一个行为过程,造成某种意义的统一,从而使人意识到神,使神意识到人。牺牲都是死物,祭礼的目的却是祈求生命。人们企图以祭礼行为来抵制和排除死的威胁,执着地追求生的希望。牺牲和祈求的每一种新形式都展示了神性和人的新意义,展示了神性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因此祭礼形成了宗教、神话等的准备阶段和客观基础。

宗教教育的另一表现是出现了占卜和巫术。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卜骨。占卜的方法是在猪、牛、羊的肩胛骨上面用火灼出裂纹,由裂纹来判断吉凶。这种活动的发展到后来导致了一些日益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占卜活动的巫者出现。他们作为最早的知识者,显现出分工的产生。其活动不仅是向自然祈求,也逐渐具有了阶段压迫的性质。

原始宗教寄托原始人的理想和情感,带有宗教意味的祭礼同时也具备诗和艺术的色彩,在上古时代,艺术追求和宗教仪式往往结合为一。正因为原始宗教在形成和培养人的情感方面有莫大作用,才使宗教与艺术相辅相成。杜威说:“情绪和想象,在形成公共的情操和舆论方面,较之报导和理性更为有效。”“历史的研究表明,原始宗教之所以有决定人们信仰和行动的力量,就是由于它们有能力通过礼节和仪式、神话和传说这一切具有艺术作品特点的东西去影响人们的情绪和想象”。

(五)原始艺术的教育功能

原始人创造的作品,也都包含着他们的希望、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宗教观念。在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装饰品,有钻孔的小石珠、砾石、青鱼眼上骨,有挖孔的兽牙和磨孔的海蚶壳等。这些装饰品的制作过程有选材、打制、钻孔、研磨、着色等。这些装饰品有的还用赤铁矿染成红色。原始时期的彩陶也是一种美好的工艺美术品。陶器上的彩绘花纹,图案和飞禽走兽,反映了当时农业劳动和渔猎活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想象力。陶器上还刻有许多符号和鱼、鹿、蛙等图像。制作这类艺术品的过程以及传授制作工艺的过程,都打上了艺术教育的烙印。由于视觉在人类整个感觉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视觉艺术在原始艺术中有比其它艺术更重要的地位。在原始人那里,艺术是增强感知能力和储藏信息的强有力手段。在原始艺术教育过程中,社会伦理规范也渐渐地增强了。新石器时代最值得注意的是,是缺乏完全自由的直接艺术冲动,而这是晚期的石器时代人们的艺术表现特征之一。新石器时期有很多精巧的技艺、磨光的工具、绘着传统图案的陶器等等,但是同时也减弱了某种创作的自由感,社会规范对人的抑制和束缚也同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显现出来了。

如果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分析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进程,那么在最原始阶段,人类缺乏传播媒介而无法沟通;第二阶段则依靠手势来交往和传递经验;第三阶段用语言来传播,口头文学、行吟诗人,就是属于口头传播阶段的产物;第四阶段通过印刷品传播知识;第五阶段通过电讯传播。前三个阶段历时漫

长,约有数十万年的时间,而从印刷术发明的第四阶段至今才一千余年的时间,所以各民族最先出现的文学形式都是舞蹈、音乐、诗歌、史诗就不足为怪了。而最初的教育也正是借助姿势语言(舞蹈)和口头语言(诗歌)进行的。

舞蹈是原始社会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舞蹈具有多项功能,如宣泄生命的活力;性选择和人种改良;操练式的舞蹈也是军事训练,具有威慑和训化人的作用;强身治病及加强社会约束力等。

由舞蹈所具的功能看,虽然舞蹈教育在原始社会以后愈益倾向于发展人的精神,但它的起始阶段始终与人的生存活动有着不解之缘。更确切地说,舞蹈教育是由最初的注重人的生存慢慢向着娱乐人的精神发展了。

音乐的主要功用在于抒发人类个体的内在感情。较早期的人所用的词,可能主要是惊慌和热情的叫喊或具体东西的名称,可能是模仿所指称的东西做出的或和它相联系的声音。最初的语言,可能是少数惊叹词和名词的集合,可能用不同声调来说这些名词以表示不同的意思。如果旧石器人有一个词指“熊”,他可能用声调或姿势来表明“熊来了”、“熊走了”、“熊将被猎获了”、“死熊”、“熊曾到过这里”、“这是熊干的”等等,声调所包含的丰富性,在现代语言交际(特别在表演艺术)中仍然可以看到。语言中的感叹词与音乐相关最密切。有节奏的感叹词在我国古代诗文中仍留存不少,如今、猗、吁、哦、唉、呜呼、嘻噫等。原始人正是以此表现自身的喜、怒、哀、乐、惊、惧等多种情绪的。最初这类感叹词都很富于音调变化,以后用文字记载下来,于是凝固的字体就难以再反映音调中所包含

的许多丰富含义。在最原始的诗歌形式中,以音调的变化作为抒发感情的基本手段,而诗的内容则成为次要的了。可见,乐与诗在古代虽然合而未分,但就诗在后世渐趋于文字表达这一点而言,乐的产生和地位都要优先于诗。原始人的音乐教育也正是在于影响别人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结成更为友好的亲密的关系。杜威在分析语言的最初功能时认为,语言虽然可以表达思想,但是,起初并不是表达思想,甚至也不是有意识的。语言的首要动机是在影响(通过渴望、情绪和思想的表现)别人的行动;语言的第二个用途在于用语言形成与别人更亲密的社交关系;语言用来作为思想和知识的有意识的运载工具,这个用途居于第三位,其形成是比较晚的。

原始社会的宗教和艺术教育旨在充实和发展人的精神生命,同时也仍然与当时人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而原始人从事审美艺术的动机,也正是为了将个人短暂生命化为较为长久的存在,最早的艺术教育就是帮助有限生命达到无限,使人从物质性存在向精神性存在不断地超越、发展。

二、学校教育的建立

(一)夏代的学校教育

中国奴隶社会开始的朝代,按照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在夏(约公元前 21 世纪~16 世纪)。它统治了 400 多年,活动的中心是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地区。夏朝的建立,是

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奴隶的逐渐增加,阶级分化的日趋明显,对异部落的战争掠夺和奴役,导致了奴隶社会的形成。而夏朝的建立和巩固,又促成了奴隶制的全面发展,开了战国文明的先河。

在夏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大体上还是木石器和一部分骨蚌器。相传,夏代已开始使用铜器,证明原始社会末期发明的铸铜器业,到这时已发展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并有成批奴隶在从事生产了。从夏禹治水和整理沟洫的传说看来,那时已有原始的灌溉技术,人们不仅在设法避免水患,而且逐渐知道利用水利,从而在农业生产上赢得了更多的主动。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积累起来。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战国时代的一些人甚至还传授夏代的历法、历书,如“夏历”和“夏小正”。这虽然不一定指原本的夏代历法,但其中很可能包含着夏代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相当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

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文字的逐渐形成,就为夏代学校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史称夏代已开始建立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礼记·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这些记载都称夏代已有学校。文字虽互有出人,但将其相互印证补充,则可认为序、校、学是夏代的学校。《说文》释“校”：“从木，交声”。孟子说：“校者，教也”。“校”当为乡学，因为据《史记·儒林列传》载汉丞相公孙弘和太常博士臧平等议论三代之学时称：“乡里有教，夏曰校”。至春秋时郑国还设有乡校，《左传·襄公